

北欧看病免费,真的如此吗?

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北欧国家的公费医疗闻名全球。在丹麦,就诊和检查均是免费,药物费用按照累进制减免。而支撑这一福利的是,普通人交税的比例达到收入的一半以上。笔者获得的丹麦政府奖学金,每月也要交36%的税。

我曾问丹麦人,对如此高昂的税率有何看法。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相信,他们今天交税帮助其他生病的人,当自己某天不幸生病时,也能获得帮助。

这个体系既有漫长的等待又有高效的细节,既有温暖的服务又有冰冷的拒绝,既有充足的信任又有偶尔的疑惑,误诊、延误诊治也时有发生。而将这些悖论融合为一体的,是全民健身的社会风气,尽量给人少添麻烦的社会自觉,总是选择信任的社会文化。

作为一个慢病患者,笔者本人在北欧的求医中经历过数次惊讶和愕然,也曾因一些温情时刻而感动,最终无奈地学会了耐心等待,少说话和知天达命(或曰,接受现实)。

丹麦官网显示人们要缴纳的税高达他们收入的一半。对新车缴纳高达150%的税,但他们很乐意纳税,因为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

2017年刚到丹麦时,我跟GP(全科医生)曾经因为一个难以命名的差异发生摩擦。我向她讲述我已患病三年,前因后果,如何服药,减药过程,等等。当时我是同时吃甲硫咪唑和优甲乐。有医生会选择让病人只吃甲硫咪唑一种方便调药量,也有医生担心指标突升突降带来眼部症状而让同时吃这两种药,但无论在家乡还是北京的医院,无论医生本人倾向哪种吃法,医生都一听说懂这些吃法和背后的考量。

但在丹麦,GP听完后就问我,我不懂,你为什么同时吃两种药效相反的药?你这样吃是没用的。我试图和她解释这是一种在中国很普遍的做法,医生的考虑是尽量缓和地调药避免眼部症状,避免药物性甲减,等等。她依然不解,生气地说如果你这样我不能医治你。

在离开后,当时的男朋友说,你刚才非常不尊重医生!你怎么可以质疑她!我说,我只是在向她解释,中国的做法和丹麦不一样不代表中国医生的做法就是错的啊;不代表我就没有道理啊。他说,但是在丹麦没有人会质疑医生,所以你跟她争论在她看来就是不尊重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我换了一个GP(因为不好意思再见她,因为总觉得在这个医患关系良好的氛围中我像个医闹),并改成只吃甲硫咪唑。

我无法总结导致这次摩擦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文化的?社会习惯的?这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傲慢?一种日积月累出的傲慢?或者只是观念差异?这只是北欧给我的第一个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随后,公费医疗体系的种种不断冲击着我——

由于各种工作的薪资水平都很高,医生又相对辛苦,愿意学医的人并不多。医学生以一部分有情怀的人和一部分移民组成(收入很高的整容医师除外)。护士更是需要从东欧国家招募。医生每天见的患者数量很少,经验相对有限。

一个例子是,我的GP在给我做心电图时,试了好几次都没打出单子。他叫来护士,才发现没有按某个键。而他读心电图的方法,是用一把尺子量每个图形的长度,然后一一对比(作为对比,国内医院心电图仪器基本会自动报告心律不齐等问题)。

但本地人没有“百度查病”的习惯,他们无条件相信医生。在这里,化验单和检查报告都以电子版发送给医生,若非主动查询或索要,患者甚至不会看到,自然也不会拿出手机查询每项指标的意义(而我在国内经常这么做……)有位朋友在听说我有甲状腺问题后,告诉我她也有,而当我问是什么问题时,她却茫然不知;只告诉我医生开了药她就吃。

北欧国家因为医疗资源有限,且是公费医疗,收治都有严格的转诊制度,而GP就是这个制度的第一个守门人。除急诊外,各种问题都是由GP先诊断,根据严重程度选择是否转诊到专科医生或医院。例如,在感冒发烧时,GP给的建议都是:喝柠檬汁、吃止痛片、发烧超过一周不退,再去找他。

而本地人如觉是小病,也都自觉不去就诊,将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必理通(对乙酰氨基酚片)是最流行的药物,在超市、便利店、药房都能买到。本地人感冒、发烧、头痛都会来一颗。但我没有吃镇痛药的惯例,最后都是睡觉、喝水和等待自愈。

丹麦的医疗体系对慢病患者来说非常方便。由于全国医院的信息连为一体,早早实现了无纸化。患者只需定期抽血,等待医生电话告知药量。药吃完了,无须预约,打电话给GP的秘书就能开药。确实省却了不断预约、去见GP和医院的麻烦。

但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比如做彩超等,等待时间则相当漫长。比如一次,我感冒后心脏持续不适,担心是心肌炎。而GP的建议仍是柠檬汁+止痛片。在听了心脏后拒绝给我任何检查。而我向专科医生预约的心脏彩超又足足在一个多月之后。无奈之下,我只得飞回国检查。

如果GP不能处理,转诊到医院,等待期依然看运气。我本人在转诊后等了两个月见到了内分泌科医生。看另一个科时,则经历过打了十几个医生的电话,终于预约到3个月之后的情况。而我体操课的同学在第一节课(9月初)摔到腿后,期中聚餐(11月底)还拄着拐杖,一蹦一蹦。

她告诉我,她的GP认为没有骨折,无须立刻手术,已转诊,排队中,还在等医院安排门诊时间。我看着她拄的拐杖,不由一脸黑线。而她却习以为常,表示确实给生活带来



很大不便,但也只能耐心等待。

由于大家都默默在家等待,医院里不会出现排队拥挤的情况。我熟悉的大医院里火急火燎的气氛(如有人插队交费时的对骂,如候诊室里人挤人的情况),在这里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所取代。患者初次见到医生时,医生会主动握手问好。但诚实地说,这个握手反而每次都让社恐的我感到紧张……

在北京医院就诊过的人大概都曾为护士抽血的速度震惊。叫号屏上的数字飞速更新,人们按着抽血点匆匆离开。而在这里,不仅不紧不慢,护士还会聊天来缓解紧张。一次,一个护士姐姐用丹麦语问我你说丹麦语吗,我说不。她就换英文问,那你说什么?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分别用这几种语言秀了一发。

有时,我忍不住设想,如果我们省略了这些寒暄、握手和聊天,是不是会有更多人得到及时救治?但如果本地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节奏,我的这种设想,是不是又落入了以己度人的陷阱?

还有一些其他周到的细节。如作为外国人,医院会配免费的母语翻译。我离开丹麦后,房东甚至还收到医院护士电话提醒我要按时复查。但温情的另一面是严格的秩序。当医生休假时,你永远不可能联系到医生。当你迟到十五分钟后,除了再次预约,就无法见到医生。

工作是工作,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即使你再急,也无能为力。这让我意识到,在国内医院常见的通融和加号,以及对患者各种大小问题(有时甚至纯属焦虑发作的问题)不厌其烦的解答,是多大的善意。

又如,在国内,只要病情属实,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轻松获得。而在丹麦,这些事务尽管微小,却有其严格划分。我曾因为签证申请需要提供健康证明咨询我的GP如何开具。她告诉我,由于这个问题并不属于疾病范畴,我需要另外预约一次自费咨询,她的收费是8000克朗每小时。又如,提供给学校的病假条盖章一次收费300克朗,学生优惠

价200克朗。

因为插队或催促在理论和实际上都不可行,而几乎每个人都温和、耐心地等待也使焦虑显得不文明,所以像我这样的焦虑症也被慢慢磨平了性子。留学生内由于急病回国求医的例子也有不少。而丹麦本地人则是坚持锻炼,尽量不去医院。

我也听过不少因等待转诊的时间过长,以致病情恶化甚至去世的例子。比如我房东的姐姐患了肿瘤,最初误诊为良性,没有及时治疗,结果突然恶化去世(要知道乳腺肿瘤在发达国家的发现和治愈率是非常高的)。但他没有任何抱怨,而是认为这就是天意。

我认识的一位爷爷,年纪大了有肺病,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长期主动要求使用近似毒品的药物(他并不是临终病人)。他确实实现了有精神头地和家人生活。后来情况不好后,更是主动放弃治疗离去。我听到这些时非常感慨——他作为老年人,住的是国家提供的免费房,房间接受了改造(能直接推上救护车的病床和基本监测护理设备),有护士每天看望,每到秋冬季会住院护理,家人并没有赡养负担——但他仍然选择要更好的生活质量,并在不能实现时洒脱离去。

这可能是他作为基督徒的生命观。在路德教为主流的丹麦,这样的观念不在少数。又或者,生活在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体系买单的环境里,他们对死亡也不那么恐惧了?

作为外来人,很难对这样的医疗体系做出客观评论。“免费”二字的美好表象背后,是漫长等待的焦灼,是病情迁移加重的风险,也是作为社会一分子对他人的自发奉献,因为一个人交的税也许用不到自己身上。

如果一定要总结,只能说,也许每个社会都有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套自治的惯性,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受益于这种惯性,也受困于这种惯性。

当阿里与腾讯握手

通常情况下,老大与老二是很难握手言和的。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这种现象更是少见。如果要问互联网行业里的老大和老二,非阿里与腾讯莫属。他们的发展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壮大,更昭示着平台经济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极致。

生态这个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相当频繁出现的,特别是在那个资本横行的年代里,同样如此。那个时候,资本巨鳄不但打造着自身的生态,巨头们同样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阿里系、腾讯系的概念,由此产生。

当某一家公司进入到某一个系统,就昭示着这一家公司受到了某一家巨头的认可,随之而来的便是其中一家的青睐和另外一家的敌视。竞争是好事,只有竞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法则。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抵不过如此。然而,竞争又是多元的,如果所谓的竞争变成了专利,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那么,所谓的竞争,就有了确定性。当确定性出现,竞争便再无意义。

巨头们之间的竞争,同样如此。如果回顾阿里与腾讯之间的竞争,支付宝与微信红包之间的支付之战可以说是一场标志性的战役。它既是阿里与腾讯之间竞争的顶点,又是两家公司的竞争模式发生嬗变的时刻。经历了支付之战之后,阿里与腾讯的竞争开始从个体之战,升级为体系之战,阿

里系与腾讯系便由此产生。

当竞争持续,一场巨头们为了维持自身优势,特别是平台经济优势而不断建构自身生态体系的过程开始上演。不断有玩家加入到了阿里和腾讯的体系当中,阿里与腾讯的生态开始一步一步地扩大。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张图片:阿里的投资版图和腾讯的投资版图。在投资版图里,除了有两家公司自身的业务之外,更多的是它们不断建构与完善自身生态体系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两家公司的投资,造就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经济的火爆。当下,人们的吃穿住行,无一不与互联网相关,无一不与平台经济相关,用互联网生活来形容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为过。

的确,以阿里系、腾讯系为代表的平台经济的发展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一切皆可实现。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在这场看似繁荣的生态下,略显畸形的现象正在越来越多地上演。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在人流汹涌中奔跑着的外卖小哥;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共享出行的司机赚不到钱的抱怨……这些现象的出现,告诉我们,平台经济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时候,同样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困在系统里。

此刻,获利的恰恰是变成了系统本身,我们,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人。以阿里巴巴遭遇天价处罚为肇始点,一场反垄断的新战役开始打响。曾经人们挂在嘴边的阿里系、腾讯系,成为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词汇。随之而来的诸多乱象,开始让人们开始反思平台经济,反思所谓的生态体系建设。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关阿里与腾讯即将握手的消息不胫而走,让曾经的传言开始朝着现实的方向迈进。据道琼斯消息,阿里巴巴与腾讯考虑相互开放生态系统。消息人士称,阿里巴巴的初步举措可能包括将腾讯的微信支付引入淘宝和天猫;双方都在分别制定放松限制的计划。消息一出,阿里巴巴盘前大涨超3%。

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告诉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已经开始告别零和博弈的时代,进入到共生共荣的时代。无论是对于阿里、腾讯本身,还是对于千千万万的用户来讲,都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

当阿里与腾讯握手,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将不再是跑马圈地的资本游戏,而是变成了一个真正以用户为终点的游戏。

随着竞争的多样化开启,玩家们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做大,做强自身的生态体系,而是开始思考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用户至上将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是变成了一个真正要落地的存在。

当阿里与腾讯握手,平台经济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开始更好地回归本质。平台经济是什么?平台经济的功能和作用在哪?在二元结构的零和博弈之下,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巩固和维持竞争双方的优势地位。

说到底,它是一个真正可以在平台经济当中建构优势的平台之间的游戏。很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会导致困在系统里,大数据杀熟等诸多乱象的出现。

当平台经济从零和游戏的范畴,开始回归本质,它将会真正成为一个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存在,而游戏当中的玩家,它们的功能和角色同样将会发生一场全面而又彻底的转型。

当阿里与腾讯握手,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将会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新的方向上,从而有了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无时无刻不再体现着互联网色彩。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渐行渐远,科技企业的竞争开始从平台转移到新的,更多的领域里。

一味地让玩家们的关注焦点聚焦在平台经济的战役里,势必会让它们失去投身新的发展的信心与勇气。在这样一个时刻,如何通过反垄断的方式让原本杀得头破血流的彼此握手言和,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由此,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上演。